

# 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

曾贻芬 崔文印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曾贻芬崔文印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ISBN 7-100-02930-9

I. 中… II. ①曾…②崔…III. 史学-文献学-历史-  
中国 IV. G257.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8542 号

ZHONGGUOLISHI WENXIAN XUESHISHUYAO

**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

曾贻芬 崔文印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930-9/K·622

---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8 1/4

定价: 27.00 元

## 题 记

我对这本论文集十分熟悉。作者曾贻芬,是我“文革”之后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之一;而另一作者崔文印,则是我在中华书局参加点校“廿四史”时收认的私淑弟子。他们二位不仅在确定选题时与我进行了商讨,而且在遇到问题时,也都是与我商量解决的。同时,他们的每篇文章,亦都是由我审阅之后,在《史学史研究》上发表的。

他们二位都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对历史文献学孜孜以求,既不趋时,也不逐利,十年如一日,扎扎实实进行深入研究。他们的每篇文章,都是在阅读大量的原始资料以后写成的,文字平实,每篇都力求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或新意,他们也确实作到了这一点。

建立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是我的夙愿,他们二位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我的一些设想。现在,文章已粗具规模,我十分高兴他们能结集出版。希望他们继续努力,把这门学科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

白寿彝

1999年4月于北京

## 目 录

题记 .....	白寿彝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萌芽 .....	1
两汉时期历史文献学的初步形成 .....	28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 .....	69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类书 .....	88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总集 .....	98
魏晋南北朝时期注释形式的发展 .....	112
隋唐时期四部分类法的确立 .....	149
隋唐时期的类书 .....	163
唐人注释书名著三种 .....	180
五代时期在历史文献学上的重要成就 .....	198
宋代的文献收集与官方藏书目 .....	210
宋代著名私人藏书目 .....	224
宋代的总集 .....	243
宋代的类书及其他资料汇编 .....	253
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 .....	274
北宋对古代文献注释的变革 .....	302
郑樵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 .....	316
朱熹的注释和辨伪 .....	332
宋代的金石学 .....	348

## 2 目录

---

略谈辽、金时代的历史文献 .....	369
元代历史文献学的概貌与特点 .....	382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 .....	396
《文献通考·经籍考》散论 .....	412
略谈明代的官私书目 .....	428
《永乐大典》概说 .....	444
胡应麟与古籍辨伪 .....	460
明代丛书的繁荣 .....	475
《经义考》初探 .....	491
略谈顾炎武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贡献 .....	506
试论卢文弨、顾广圻的校勘异同及其特点 .....	522
钱大昕的历史文献学 .....	540
说《古今图书集成》及其编者 .....	557
后记 .....	574

#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萌芽

## 一 孔子的“述而不作”

### 六经的整理

中国历史文献,始于甲骨文字。中国历史文献学,由孔子发其端。孔子对六经的整理,就是对后来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文献学的实践活动。

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是孔子讲学的基本内容。孔子选定六经,是各有其用意的,他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絮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sup>①</sup>

可见,每一经,孔子都强调一个重点,都有一个明确的教育目标。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上自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期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另,“小雅”中还有笙诗六篇,有目无辞,不在其内。《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孔子十分重视《诗》,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sup>②</sup>这里所谓的“兴”,即《诗》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的“兴”,是《诗经》常用的一种比喻方法,故“可以兴”,就是说可以提高这种联想或想象能力。这里所谓的“观”,即“观风俗”的“观”。班固说: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sup>③</sup>何休亦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间求诗……闻于天下。”<sup>④</sup>其目的，则在于使“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sup>⑤</sup>这就不难看出，读《诗》显然有宜于了解民俗、国情，故孔子说，“可以观”，即提高观察能力。至于“群”和“怨”，按照杨伯峻先生的解释，即“合群力”和“讽刺方法”，读《诗》于这两方面亦是有益的。总之，孔子认为，读《诗》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使其“温柔敦厚”，这样，无论“事父”，还是“事君”便两项都合格了。

据汉代史家司马迁说，《诗经》是由孔子编定的。他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sup>⑥</sup>

古者是否有诗三千余篇，虽不敢必，但从司马迁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现存《诗经》的次第是由孔子编订则是确定无疑的。故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sup>⑦</sup>鲁襄公二十九年，也就是孔子七八岁之时，吴公子季札曾被邀至鲁观周乐，其演奏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郕（以下无评）、小雅、大雅、颂<sup>⑧</sup>。看得出，其“国风”次第与后来流传的《诗经》次第有所不同，足可证明，《诗经》确是由孔子最后整理编定的。

《书》即《尚书》，是唐、虞至春秋前期，主要是殷周时期的历史档案和文件的汇编，《史通·六家》引孔安国的解释，说《尚书》就是

上古之书。据说,《尚书》原有一百多篇,但经过秦始皇焚书,流传至今的《尚书》只有五十八篇,而且还真假掺半。这五十八篇的情况是:

《虞书》五篇,其中伪一篇;

《夏书》四篇,其中伪二篇;

《商书》十七篇,其中伪十篇;

《周书》三十二篇,其中伪十二篇。

《虞书》四篇(以下皆不计伪篇),即《尧典》《舜典》(按:实即《尧典》的后半部)《皋陶谟》《益稷》(按:实即《皋陶谟》的后半部),所记主要是虞舜的一些历史传说,包括尧禅位于舜,和舜的一些活动等。因中心所记为虞舜,故称《虞书》。

《夏书》二篇,是专记大禹父子事迹的,《禹贡》记大禹治水后,全国的山川概貌;《甘誓》则是大禹的儿子启征伐有扈氏的誓师之辞。

需要说明的是,迄今尚未发现有夏代的文字,或者夏代很可能还没有文字,那么上述二书的文献,就不可能是虞、夏当时的文字记录,而是后人根据口碑传说整理成文的。

《商书》七篇,即《汤誓》,《盘庚》上、中、下,《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其中除《汤誓》记汤伐桀,是商的早期史料外,其他皆是盘庚迁殷以后的史料,而《盘庚》三篇,即“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因而向臣民讲的话,是较原始的档案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周书》二十篇,即《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按:即《顾命》的后半部,故篇名伪而实不伪)《吕刑》



《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其中从《牧誓》到《立政》凡十四篇，较为系统地记载了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还政于成王的史实。《牧誓》就是牧野之战前，武王誓师的誓辞。武王死后，“三监及淮夷叛”，周公与成王再举东征，并为彻底平息殷人叛乱，采取了种种措施等等，所收亦都是较原始的档案材料，具有第一手或接近第一手材料的性质。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所谓的“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其“周诰”，即泛指《周书》中的《大诰》、《康诰》以及未标“诰”名、而实为同一类文字的《多方》《立政》等，这些篇都是《尚书》中的精华所在。

从上述篇目中不难看出，《尚书》中的文件主要是“典”、“谟”、“誓”、“诰”之类。所谓“典”即经典，对所记人、事含有尊崇之意，如《尧典》《舜典》之类即是。“谟”即“谋”，这是为谋议之意，是一种商讨性质的问答体。但以上两种在《尚书》中所占比例较小。“誓”即誓辞，“诰”即告谕，是上对下或长对幼的教导、训谕之辞，这两种在《尚书》中占了绝大部分，由于这种誓、诰多为上古口语的记录，故很难读懂。

关于孔子与《尚书》的关系，司马迁说：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sup>⑨</sup>

班固亦云：

《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sup>⑩</sup>

综合马、班二人之说，可以认为：①有关三代及殷、周的文献，当时

都称作书,故班固有“书之所起远矣”的感叹。②由于周室的衰微,这些文献多所散佚。③正是孔子,访求、收集这些文献,“编次其事”,“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可以肯定的指出,《尚书》是由孔子编定的。④孔子不仅编订了《尚书》,还为每篇写了“序”,“言其作意”。故唐代的刘知几说:“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sup>①</sup>孔子为《尚书》作序,这乃是讲授《尚书》的需要,即每讲一篇,他需要向学生讲明这一篇的所由产生,以有助于理解其内容。后人怀疑这些序是否真是孔子所作,其实,这和《论语》中的“子曰”一样,不必咬定字字必出孔子,极大的可能仍是孔门子弟记录或记忆孔子之语,并最后笔之于书的。《尚书》流传坎坷,甚至迷离扑朔,因此,现存《尚书》除伪篇不计外,就是那些非伪的篇章,有没有混进后人的东西也很难说。正文尚且如此,序的情况便不言而喻了,这是需要在这里特别予以说明的。

《乐经》已亡,我们无由考论。

孔子说的《易》是指《周易》。我国古代占筮之书都叫易,一般认为,《周易》即周朝的占筮之书。

《周易》有传七种,这就是《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其中由于《彖》《象》《系辞》各分上下篇,故七种总计有十篇,这就是所谓的《周易十翼》。高亨先生说:“《周易》古经自有了《十翼》以后,便不仅是筮书,而且跨进哲学著作的领域。”<sup>②</sup>《十翼》的解释并不注意占筮,例如《文言》对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四字解释说: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

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通过这样的解释，本来用于占筮的“元亨利贞”，则成了君子修养的四德。这就非常清楚，这种解释，在“占筮”之外，赋予了《周易》一书不少新的东西，用高亨先生的话说，这“好像借《周易》古经的旧瓶，来装自己的新酒”<sup>⑬</sup>，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周易》一书的固有性质，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

《周易》的作者相传为文王，虽不能确定，但其书“写于西周初年”<sup>⑭</sup>，则是接近实际的。

《十翼》的作者，传统的看法为孔子。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sup>⑮</sup>孔子确是“喜《易》”，曾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sup>⑯</sup>在《文言》和《系辞》中，据高亨先生统计，共有三十个“子曰”，这个“子”称颜渊为“颜氏之子”，故当然是孔子无疑。特别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没有《彖》《象》《文言》，但有另外三篇，其中一篇题作《要》，专记孔子与弟子有关《周易》的问答。足见孔子不仅“喜《易》”，而且研究《易》，并向学生讲授《易》。学生根据他的讲授内容，整理成文字，笔之于书，这应该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周易十翼》，故《十翼》出于孔子，成于他的学生，是很可能的。可以认为是孔子赋予作为筮书的《易》以新的内容。前人以为《十翼》“皆非孔子作”<sup>⑰</sup>，如果这个“作”专指笔之于文字，还有一定道理；如果这个“作”指这些东西与孔子无关，则就偏离事实了。当然，十篇文字，必非出自一人之手，其水平也自然要有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十翼》源于孔子，与他有很大的关系。

《易》是靠阴、阳变化而推演六十四卦的，这种变化有时甚为细微，故《易》可以使人“絜静精微”，不苟且。“子不语怪、力、乱、

神”<sup>⑧</sup>，因而，孔子讲《易》并不注重它本来的神秘性，而是赋于了它一种新的含义，这在《十翼》中是表现的比较清楚的，这也从侧面证明，《十翼》是与孔子有密切关系的。

孔子说的《礼》，是指《士礼》，即今之《仪礼》。这是古代士大夫应该掌握的冠、昏、饮、射、聘、觐，及至丧葬、祭祀的诸礼仪。司马迁说：

《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sup>⑨</sup>

司马迁还说过，“《书传》《礼记》自孔氏出”的话，故洪业先生云：“既曰‘《礼记》自孔氏出’，又曰‘于今独有《士礼》’，是《礼记》即《士礼》也。”<sup>⑩</sup>洪业先生还论证了《士礼》在当时亦称作《礼》或《礼经》。按着司马迁的记载，《士礼》在孔子时，即已“不具”，故孔子有礼崩乐坏之叹，有“之杞”、“之宋”之举，以访求这些散佚的文献。虽然，在这之后，孔子有“杞不足徵”之憾，但他与《礼》的关系，由此则可见一斑。

孔子十分重视礼，他把礼和他提倡的“仁”联系在一起，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sup>⑪</sup>不唯如此，孔子自己还身体力行，如“席不正，不坐”，<sup>⑫</sup>“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sup>⑬</sup>，“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等等<sup>⑭</sup>，都与礼有关，或者说，都是按着礼行事的。礼可使人不卑不亢，在不同的场合，行动得体，故孔子认为礼教的结果，可使人“恭俭庄敬”。由于孔子明礼，故时人问礼多从孔子。《礼记·杂记》下云：

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

《士丧礼》即今《仪礼》中的一篇。这段话至少可以说明：①士丧礼

当时所知之人不多,连号称礼仪之邦的鲁国公室亦所不免。②自鲁哀公使孺悲向孔子学士丧礼,《士礼》中的《士丧礼》才得以广为传播。足证孔子对《士礼》的主要贡献在收集、传播等方面。

关于孔子所言“属辞比事”之“春秋”,这里有两个含义:一即鲁国当日的史书,二即孔子因鲁史旧文而修的《春秋》。从一般情况看,当时各国的史书多叫“春秋”,故墨子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等语<sup>⑤</sup>。但也有不叫“春秋”的,据孟子说,晋叫《乘》、楚叫《梲杌》,虽然名称不同,但与“鲁之《春秋》一也”<sup>⑥</sup>,就其内容而言,这些史书“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sup>⑦</sup>即以各国君主为中心,真实、朴直,不雕饰地记载一国大事。可以想见,每国每天都要发生或遇到很多事,记哪些?不记哪些?怎样记?其中当然有一套学问,这套学问,即孔子所谓的“属辞比事”。此其一。

其二,据记载,孔子确曾因鲁史旧文而作《春秋》,孟子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sup>⑧</sup>。

关于《春秋》的具体情况,司马迁说:

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sup>⑨</sup>孔子修《春秋》以后,一般称鲁国旧史为“不修《春秋》”,“不修”二字,简明地表现出二者的不同。如《公羊传》庄公七年云: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

寥寥数语即可以看出《春秋》“约其文辞”的特点，也大体可见他是如何“属辞比事”的，而且还对鲁史旧文记载不确处做了修正。不过，孔子修《春秋》是他晚年的事，故孔子所说的“《春秋》之教”，更多的应指鲁史旧文。

孔子向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sup>①</sup>，长期以来人们都把这当成孔子对历史文献的态度。其中，包含：①所谓“述”，既包括讲述，又包括对文献的整理；“述”与“整理”是相辅相成的，“整理”是为了“述”，而“述”必将更好地促进和提高整理。②所谓“作”，应即孔子所说的“不知而作”。他说：“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sup>②</sup>这就是说，孔子并不反对在“知”的情况下而有所作，事实上，孔子整理与讲述六经，有很多都是他独到的见解，都是他的“作”，因而最后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儒家学派，如果没有“作”，焉能独树一帜？③综上所述，孔子所谓的“述而不作”，似应理解为，他对古代文献的讲述，是经过研究，弄懂了的，而不是凭空造作或无知妄说。④孔子向来认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只有这样，才“是知也”<sup>③</sup>。这可以再度证明，孔子所谓的“不作”，决不是简单地不搞“创作”，而是指的绝不“不知而作”。这是对讲述古代文献一种极为严谨的态度，这种态度，应该是和他“信而好古”有联系的，或者更进一步说，是由其“信而好古”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经由孔子整理和编修的《诗》《书》《易》《礼》《春秋》才一直、并且基本完好地流传了下来。

在上述五经中，除《春秋》是孔子所编修外，其他古代典籍，都是不同程度地经过了孔子的整理。从孔子对古代文献整理过程

中,我们已不难看到我国历史文献学的萌芽:

一、访求文献。如何访求文献,是历史文献学的内容之一,孔子十分注意访求古代文献,他说:

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sup>③</sup>

杞是夏禹之后代,宋是殷商的后代,故孔子欲得夏、殷的文献,便来到了杞、宋二国,虽然二国的文献皆不足徵,但孔子毕竟不虚此行,他得到了“夏时”和“坤乾”两类文献。据汉代郑玄说,所谓“夏时”,即关于夏四时的书,其书存者即《夏小正》。“坤乾”是殷代关于阴阳的书,存者有《归藏》。今《大戴礼》中确有《夏小正》,是历书,与郑玄注合,但其是否作于夏代,则不敢肯定。至于《归藏》,现已亡佚,无从查考。不难看出,如果说“因地求书”,是访求文献一个重要途径的话,那么,孔子正是开了“因地求书”的先河。

二、鉴别文献。文献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产生讹误,对于这一点,孔子总是不盲从,而是予以鉴别,辨其正误。《吕氏春秋·察传》记载这样一件事: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这里传说夔只有一只脚,经孔子考订,本是说像夔这样的人,有一个就够了,故曰“夔一足”,而不是说夔只有“一足”。类似的记载还

有不少,如“丁氏穿井得一人”,“桓子穿井得狗”等等,孔子都能一一正其讹误。孔子强调:“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sup>④</sup>孔子反对那种自己不懂,却要凭空造作的人,而主张多闻、多见,孔子所以能够鉴别文献的讹误,其原因正在这里。不难看出,多闻、多见,“择其善者而从之”,这不仅有文献学中的考证因素,也包含着一定的校勘因素。

三、条理文献。孔子一向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sup>⑤</sup>,一心理头于对古文献的整理。不少古代典籍的编订,都和他有着不同程度地关系。例如《诗经》,它的编订次第是风、雅、颂。而这个次第,就是孔子确定的。他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sup>⑥</sup>根据《左传》记载,孔子自卫反鲁,事在鲁哀公十一年冬。这里关键是“雅、颂各得其所”,杨伯峻先生说:“《雅》和《颂》一方面是《诗经》内容分类的类名,一方面也是乐曲分类的类名。篇章内容的分类,可以由今日的《诗经》考见;乐曲的分类,因为古乐早已失传,便无可考证了。孔子的正《雅》《颂》,究竟是正其篇章呢?还是正其乐曲呢?或者两者都正呢?《史记·孔子世家》和《汉书·礼乐志》则以为主要的是正其篇章……”<sup>⑦</sup>不管孔子是正篇章,还是正乐曲,他这种对文献的条理,已显然有了文献学上对文献分类的意味。当然,文献学上的文献分类是较为复杂的,它既是个实践问题,又是个理论问题,但不管怎样,孔子在这方面总是开了先河的。

四、讲解文献。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以《诗》《书》《礼》《乐》教”,对古代文献作了大量讲解。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sup>⑧</sup>孔子解释古



文献,不拘泥于文字音训,而注重挖掘其内涵的深刻道理,并希望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由此及彼。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sup>④</sup>他是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却说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东方,他却不能由此推知西、南、北三方,便不再教他了。孔子解释古文献确实不拘泥字句,而是重在阐说义理。据司马迁说,《周易》之“十翼”应是孔子所作,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后人虽对此说极加怀疑,但从“十翼”所引之“子曰”中,亦不难看出孔子和《周易十翼》的关系,这和他解释《诗》是一脉相承的,即他并不拘泥于《易》作为筮书的特点,而是加入了自已许多新的东西。

五、评介文献。这里说的评介文献,不是指长篇大论的夸夸其谈,而是指简明扼要的画龙点睛。这种画龙点睛式的评介文献,后来便成了叙录体著录文献的重要方法。孔子极善简明扼要地评介文献,他评介《诗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sup>④</sup>这是用一句话,甚至只是三个字,便评介了《诗经》一书的思想纯正。他还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sup>④</sup>这些评介,都要言不繁,一箭中的。孔子还评介过《诗经》中的个别诗篇,他评论《关雎》这首诗时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sup>④</sup>都简洁明快,毫不拖泥带水。

在六经的一些经中,如《尚书》《诗经》,都有所谓大小序,大序冠全书,小序冠诸篇,都是对一书或一篇的指导性说明。例如《诗经》大序,就把诗的产生,何谓风、雅、颂等都作了简要说明,这对读《诗》无疑是有裨益的。至于小序,更是提纲挈领,将一篇的作意讲得十分清楚。例如《尚书·汤誓》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陟,遂与